



中 / 外 / 诗 / 歌 / 翻 / 译 / 丛 / 书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

Aspect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Verse Classics

杨成虎◎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突破了“长篇大论”的写作模式,以自由、活泼、轻松、机智的散论形式就中国诗歌典籍英译的理论热点进行讨论,系统论述了诗歌典籍的概念、译语、译者、版本、考证、译本等问题,深入阐发了诗歌典籍英译是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主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杨成虎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5

(中外诗歌翻译丛书)

ISBN 978-7-118-08034-6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诗歌—英语—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885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½ 字数 252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88540777

发行邮购:(010)88540776

发行传真:(010)88540755

发行业务:(010)88540717

简论作为典籍翻译的中国诗歌

——序杨成虎教授《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

我和杨成虎教授相识，有多年了。

早在世纪之交，我调入天津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成虎就在天津工业大学教书。他给我的印象是老实持重，不浮不躁，潜心做学问，注重理论，不薄实践，有安徽人的细心考证的习惯和很好的文字表达功夫。后来，我知道他能写诗，译诗，而且翻译了《离骚》，就更多了一个诗歌交往和交谈的层面。他在读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以后，就到了宁波大学任教。成虎对于汉语和英语都有研究，这更增加了他对于诗歌翻译的理论兴趣和研究能力。说实在的，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在诗歌翻译和研究领域，并不是很多见的。而在诗歌翻译和研究领域，能写诗（特别是古体诗）的译者也不是很多见。三者具备，可以说奠定了杨成虎教授诗歌翻译和研究的多方面的基础。

这本《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大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这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和智慧，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成虎邀我作序，我就很欣然地答应了。

一本书称其为“散论”，虽然文体和写法上比较“散”，其实还是有系统的，而且有可以值得一提的要点和侧重。成虎本人概括为“总论、语体论、借鉴论、特征论和译本论”，当然是颇为允当的。不过，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 模式化的理论思维模式与评论性研究并行。

也许是受到语言学科学理论思维习惯的影响，成虎的理论研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模式化思维的倾向。特别是在总论部分，作者对于研究对象具有总体的宏观把握，再按照一种逻辑关系进行理论构思和阐述，就使得条目清晰，直观而全面。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特点。当模式思维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学术特点的图示方式，而不仅仅是基本概念和分类表示的树形图，也不是一般的语体关系图示了。

2. 对于中国佛经翻译的理论继承与文本考证。

一般说来，佛经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很难和中国诗歌的英译问题联系起来，不过，在成虎那里，佛经中的“偈”就是诗歌，其翻译当然是诗歌翻译了。不仅如

此,佛经翻译的理论也可以为诗歌翻译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路的借鉴,因此,考证佛经译论本身,就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了。在这一方面,《大藏经》和《出三藏记集》中的《法句经序》的文字考证和文本对比,可谓详尽而微。

3. 对于国内外中国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经验总结。

虽然成虎有自己的翻译主张和实践,但他却能把古今中外的翻译家的思想和做法纳入自己的关注视野,进行综合的或比较的评述。这似乎很容易,但实在不容易做到。例如,在涉及《诗经》《楚辞》的翻译时,成虎不仅评论了国内当代的翻译家,如孙大雨、杨宪益、许渊冲、卓振英等人的译文,而且对于国外汉学家如韦利、理雅各等人的译本和翻译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中寻求多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肯定了不同的翻译价值,如经学价值、文学价值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介绍了雷克斯罗斯的“融创于译”的诗歌翻译思想。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翻译鉴赏力和理性思维能力,而且可以丰富自己的翻译经验和笔法表现,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4. 各种诗歌体制的兼容并包和功能互补。

如何对待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化的传统?这是诗歌翻译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持续不衰的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和一致的认识。作为对诗歌非常敏感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成虎自然具有很强的诗歌形式感,他把诗歌翻译分为散体和韵体、民歌体等体制,处理上分为归化和异化等翻译倾向,以及音译加注、直译加注、音译加解释、译语借用、省略添加等翻译方法,注意到诗歌标题和主题、词语与句法以及一些具体篇章的翻译情况,例如,《九歌》、《天问》,都有比较详尽的讨论。这些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比较研究或单独研究,一般都能深入到具体的词句表现和修辞处理,做出具体的审美判断,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褒贬,有思考,不扬长,不护短。这种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对于发展当前的文学翻译批评,推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成虎这本书中我所见到的主要价值,至少是值得学界注意的几个方面。当然,成虎本人的翻译在其中也得到了较好的流露和发挥。一方面,他在研究古人、今人及外国译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也在评价与分析中得到比较、鉴别和检验。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个青年学者和翻译家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可贵探索和有益思考。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我有相似的感觉。

下来,我想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翻译的几点认识,以请教于方家:

我的一个基本的主张和认识,是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经典文献,它的翻译和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总体上应当有一定的区别。这并不是说这些诗歌本身会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选取一些更加具有文

化因素和典型性的诗歌作为代表),而是说,当我们把诗词作为文化典籍来翻译的时候,应当更加注重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的保持和传达。当然,这种保持和传达不应当是机械的、勉强的,而是要讲究条件和注重效果的,甚至要求有一定的艺术性的。另一方面,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的翻译,则应当允许有更多的灵活性,更多的会关注艺术表现的层面和翻译表现方法的灵活性,甚至可以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创意和创译,其中包括可以借鉴雷克斯罗斯的“融创于译”的翻译方法。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达这一基本观点,我们可以按照“文献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两极划分做出下列对照表:

A. 文献翻译	B. 文学翻译
1. 选择更具有文献色彩的文本	1. 选择更具有艺术性的文本
2. 有明显的异化倾向	2. 有一定的归化倾向
3. 保留重要的原语文化因素	3. 适当淡化原语文化因素
4. 不允许译语文化因素进入	4. 允许译语文化因素进入
5. 必须区分诗词形式	5. 可以不区分诗词形式
6. 必须译为格律诗	6. 可以译为自由诗
7. 尽量保持古典诗歌趣味	7. 可以允许现代诗歌趣味
8. 不允许创造新形式	8. 允许创造新形式
9. 保留词牌和标题	9. 删除词牌,另立标题
10. 针对中国大陆读者	10. 针对外国或海外读者

以下逐条加以解说:

1. 关于文献色彩和艺术色彩的文本的区分。

一般说来,所谓典籍,应当属于文献类型的书籍和文本,例如中国所谓“经学”一类文本,以《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为代表。虽然《诗经》也被列为经,而且经过了儒家伦理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经学化过程,但在总体上,诗歌的理解和翻译,和诗教的理解和翻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总体倾向而言,《诗经》的文学翻译是一种返本清源的诗歌翻译活动,代表了一种新的诗学观点和翻译潮流。不过,在历史上,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点的分类研究及翻译实践,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为《诗经》的研究和翻译开辟了新的道路。不过,总体而言,《诗经》仍然应当归入艺术类,即便作为文化典籍,也是有别于一般文献类的。

2. 关于翻译倾向于异化还是归化的问题。

要保持一种文化中的文献性文本的翻译,作为认识价值的主要承担者,就需要一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即尽量保持原始文献的历史文化价值,诸如其中的地理

人文环境状况的描述(《诗经》中就是名物的准确传译),历史基本事实与发展规律的表现,以及人文价值观的完整表述;相反,如果是作为文学类艺术类的文本来处理这些资料,就不比过分拘泥于原初文化的背景和事实,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文化上,使其易于为移入语读者所接受。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只能归化或者异化,都是有偏差的,容易混淆不同的类别和性质,致使翻译的效果不佳。

3. 关于是否要保持原语文化要素的问题。

当然,如果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就要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不能随便舍去或简化。例如,中国历史年号保持与否,对于历史叙述就至关重要,虽然转换为公元年代有利于沟通和世界历史的时间维度,但若完全取消了中国的朝代和年号,则其内部的政权的更替关系就不清楚了。在这个意义上,例如历代官制和官职的名称,也是应当保留的了。但若在一首诗里,送一位即将赴任的诗人朋友到江边,如果要把官职、排行等都翻译在标题里,其实和诗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也可以想出其他的办法来,淡化这些要素,突显诗歌要素,草拟出一个更好的诗歌标题来。

4. 是否允许移入语文化、文学因素的介入。

这个问题很具体,也很棘手。在文献性翻译中,如果允许,就会造成误解和误读,影响对原语文化表达和理解的纯粹性。当然这样说是有条件的,因为语言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族文化的因素,但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例如,不考虑用英语的 province 翻译中国的“省”是否有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具体到诸如文学意象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例如,典型的中国诗歌的“桃花”能否改变成英文的“梨花”的问题,这是典型的朱湘翻译问题。当然,在原则上,改变和不改变都应当是允许的,否则,这个问题就根本用不着讨论了。还有,中文的“菊花”和英语概念中的“菊花”会有什么差别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悠然”一定要用一个词翻译出来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困扰译者,但我们认为,应当给诗歌译者一些灵活的余地,而不能限制过死。

5. 翻译中是否要区分“诗”和“词”的形式。

我以为要看情况。一种就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要表现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变化的时候,“诗”和“词”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因此,有翻译成为 poem (诗)和 Ci poem (词)的必要,例如,外文版《毛泽东诗词》所处理的那样。但是元曲,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专门的名称翻译出来,也许可以译为 Qu poem。不过,对于国外一些比较开放的译者,特别是那些主张创意翻译的译者,“诗”和“词”的区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们译诗的基本格局都向现代诗的方向转化了,何况他们对于诗词的形式感,本来也不十分好。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古典诗词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一定有必要区分“诗”、“词”、“曲”

的形式吗？或者说，这种区分如何能够获得具体的实现了的诗歌文本意义，换言之，甚至能否为本来就无法区分此类概念的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6. 要译成格律诗，还是允许译成自由诗？

“一定要译成格律诗，因为原文是格律诗”。这在原则上也没有什么异议。也就是说，一定不可能有一种认识，认为格律诗必然不能译为格律诗，何况还有借用英语格律诗的形式感来传达中国古典的格律诗的套用途径呢！但是，问题在于，在格律诗内部，也可以有严谨的格律诗和松散的格律诗，而在格律诗之外，尚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诗。如何可以利用这些“自由的”要素和营养，丰富和加深格律诗的表现力，是一个好问题。完全拒绝这种借鉴，便没有足够的理由了。进一步而言，译成格律诗有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如同以音害义的问题，以形害义的问题，还有格律诗在形式上已经不新颖，不大为现代人所接受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外，英语世界中的诗歌，基本上都是自由诗了。这样，综合两种认识和格局，我们固然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格律诗，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自由诗的做法和尝试。以类型说和形式对应为理由，也许不是最有说服力的。

7. 在感情问题上，是否要以古译古，也是一个问题。

既然是古典诗词，是表现古人的情感，就应当以现代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这已经是比较开放的观点了。按照古典诗歌的形式，表现古代人的情感，按照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原作，就更没有问题了。然而，古代人的情感，难道就没有现代人的情感因素？或者说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情感，究竟是类型之间的截然划分，还是一条连续的发展带，其中许多是程度的体现呢？再者，假若原原本本地译出古代人的情感，是为了还原中国文化的古典状况，给今人以认识的参考，这是一种可能，那么，逐渐把古代人的情感和现代人相交流，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现代人情感，以飨现代读者，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和完全没有必要的。

8. 是否允许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作为一条途径，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

这同样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里我们不想涉及更多的问题，只想提及外国的现代诗和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诗”（包括现代派诗），不仅仅是为了提醒大家不去忽视这样广泛的诗歌资源和发展动向，而且要在古典诗歌的发展和出路的意义上提及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涉及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开课问题的时候，朱自清就明确强调了学习古典是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立场。这一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解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以及作为一种可能的途径来翻译古典诗歌的时候，现代诗歌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和出路的理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9. 词牌曲牌是否要保留的问题。

古典诗词的翻译，特别是宋词和元曲，词牌和标题是双重的设置，而标题更

为重要,词牌只具有形式感,而且可以说只具有汉语诗词的形式感。词牌曲牌本身,不仅在翻译时,完整的表达极为困难,而且许多时候,显得叠床架屋,累赘不堪,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现在的词牌曲牌翻译大多数是意译,在很多时候,干扰了诗歌的标题,而音译,则没有实际的意义,显得多此一举。尽管如此,在剧本中,词牌曲牌由于和演唱形式有关,在有些时候仍然具有保留的必要,但是尽管如此,也只是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普遍可以坚持和保留的。例如,海外一些译家所翻译的昆曲剧本,就不保留原来剧本中的曲牌名称,直接译出演唱的段落了事。

10. 最后,古典诗歌翻译的读者问题。

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应当是给外国读者看的,给那些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看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应当针对外国和外语读者,让他们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和形式,情感和思绪。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千篇一律地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格律的古典趣味的和古汉语印象的译本,当然,也不能不假思索地认为,所有的外国读者都是自由诗派,甚至是现代派诗歌的爱好者。这是因为,从海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倾向看来,最严谨的格律派和最开放的自由派都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译者和读者,在国外和国内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的倾向,在于自由的多样的探索和鉴赏),注意到这种区别,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可以使我们保持开放的视野和灵活机动的态势。

显然,以上列表和简要的阐释并非想把这个问题按照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提出来,甚至把二者的关系对立起来,而是尝试作为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出发点,把这些项目先确定下来,从多方面加以阐释,借以探讨各种可能性和不同的思路。当然,归根结底,这种表述本身,也就意味着或包含着诗歌翻译问题上早就存在的二律背反,只不过有的问题早已明朗化,有的问题是新近才涌现出来引起注意罢了。这几乎是任何一个翻译诗歌的人都不得不面临和对付的问题。我自己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想法,也是在阅读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激发和联想的结果。现在,把这些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也是为了间接地回答本书稿的作者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请教方家,赢得必要的和更好的解决。

祝贺杨成虎教授有更多更好的翻译和研究成果问世!

祝愿中国的典籍翻译事业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

王宏印

2012年3月

前 言

PREFACE

典籍翻译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相互学习传承文明的重要文化现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典籍翻译都源远流长。在中国,佛经汉译肇始于东汉明帝(58—75)时的摄摩腾和竺法兰,其后佛经翻译历代不断(其中包括藏传佛教的佛经藏译),直到清代的“国语翻译藏经”,佛经翻译在中国持续了近 2000 年。以清康熙三十年(1691)由外国译者完成的首部英译本《论语》在伦敦出版为标志,中国典籍英译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在西方,从公元前 3 世纪至今的 2300 年间,基督教典籍《圣经》的翻译同佛经翻译一样也从未间断过,《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拉丁文、古叙利亚文、埃塞俄比亚文、哥特文、亚美尼亚文、努比亚文、(古)英文、德文、斯拉夫文、法兰克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波兰文等 500 多种文字。与此同时,古希腊、阿拉伯等地文学、哲学、科学等经典也纷纷被翻译成拉丁文、德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当今,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中国典籍英译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有关高校的译者和学者进行着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出版了《大中华文库》,系统推介中国典籍。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同时,理论研究也一直在进行。在中国的佛经翻译中,学者们努力探索佛经汉译的理论,出现了“案本”、“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这样的主张或体系。在西方,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从翻译方法、技巧、过程,到翻译本质、原则、标准,再到语言特征、文化特征等,学者都有论述。随着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深入,经典翻译工作进入 20 世纪和 21 世纪,又有了新的进展。20 世纪,《圣经》翻译工作在美国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开展,产生了像奈达“功能对等”这样的理论。韦努蒂在对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翻译的研究上提出了“译者主体性”和“异化”理论,随后又为古希腊、罗马经典翻译构建了一个语言学性质的“译释论”,力图解决经典翻译理论中尚未解决的有关问题。在当今中国典籍英译中,产生了许渊冲先生的“三美”理论和汪榕培先生的“传神达意”理论。在长期的典籍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对其中的理论问题有着各自的见解,产生了各自的认识和各种理论。

典籍翻译中,诗歌典籍英译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一种特殊的研究。诗歌典籍英译与诗歌英译不同。后者侧重于译本的流畅性(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兼顾诗体和声律),而前者则是译本的学术性与流畅性的统一。所谓学术性,指诗歌典籍在历代的注释和研究中所产生或承载的思想价值。语言文字是文化与文明的主要载体。典籍正是各民族通过语言文字的载体流传下来表达该民族最优秀文化和思想的文本。语言文字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典籍的传承依赖于语言文字的变化。

我们认为,诗歌典籍英译是译者因其时代需要对原文本进行思想价值的探究,并由此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的疏解。诗歌典籍注疏是后代学者对原文本在词汇层面上进行的零散性疏解,目的是解决原文本语篇的流畅性问题,而诗歌典籍英译是后代译者运用英语对原文本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的整体性疏解,目的是对原文本的思想价值进行语篇重建。

在典籍的传承中,由于历史时代的变化,后代学者使用自己熟悉的时代语言对典籍中读者陌生的概念和词语进行注释以使原有的语篇流畅化;由于民族国家的变化,后代译者也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母语或外语)对读者陌生的原典进行训释,而英译和注释的共同之处都是对原文本版本及思想价值的探究和对原文本语言因时因地的嬗变,只是前者是语际的,在语篇的层面上进行,后者是语内的,在词汇的层面上进行。从语文学的视角来看,诗歌典籍英译可以认为是诗歌典籍注释概念的延伸,而译者则是注释者的延伸。关于翻译与注释的关系,韦努蒂的“译释论”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经典形成于翻译,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语篇层面的)训释。训释是使用新的语言来解释旧的语言,是为读者服务的语言更新,翻译是使用译入语来训释译出语,也是为读者服务的语言更新。经过后人训释的具有思想价值的文本便是经典。由此,韦努蒂根据语文学的传统将“训释”发展为“训释语”(interpretant)这一新概念。韦努蒂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赋予“训释语”内涵的。一是从原文本到译文本层面上的训释语(即对原文的语篇训释),一是从译文本到价值论层面上的训释语(即译文本的语言是对原文本思想价值的训释)。作为读者熟悉的解释原文的一种语言,训释语不但是对原文语言的训释,更是对原文思想价值的训释,是经典翻译的重要概念,它从理论上解释了经典是通过“训释”得以形成和传承的道理。

英译与注释还有另一层关系,即在诗歌典籍的英译中,译者往往参照(原文的)注释来进行英译。例如,《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

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闾闾，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蘼，聊可与娱)的注疏。上节首二句，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汉代毛亨《毛诗故训传》：“如云，众多也”。这两条注疏解释了首句的句义及其原因。上节末二句，宋朱熹《诗集传》：“缟，白色。綦，苍艾色。缟衣綦巾，女服之贫陋者”；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云，员古今字，助句辞也”；下节首二句，许慎《说文解字·门部》：“闾闾，城曲重门也”；朱熹《诗集传》：“荼，茅华，轻白可爱者也”。下节次二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且音徂，《尔雅》云：存也”，就是说，“且”与“存”同义，只是为了杂沓诗节中押韵的需要而换用的同义词。下节末二句，朱熹《诗集传》：“茹蘼，可以染绛，故以名衣服之色”；汉代毛亨《毛诗故训传》：“娱，乐也”，即“娱”与“乐”也是同义词，为了押韵的需要而改用“娱”字。我们首先以理雅各英译为例，来看看英译对注释的依存关系：I went out at the east gate, / Where the girls were in clouds. / Although they are like clouds, / It is not on them that my thoughts rest. / She in 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grey coiffure, ... / She is my joy! // I went out by the tower on the covering wall, / Where the girls were like flowering rushes. / Although they are like flowering rushes, / It is not of them that I think. / She in 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madder-[dyed coiffure], ... / It is she that makes me happy! 理雅各在英译时有王蹈等中国学者的帮助，参考了原文的注释，如“东门”(the east gate)、“如云”(in clouds)、“缟衣綦巾”(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grey coiffure)、“闾闾”(the tower on the covering wall)、“如荼”(like flowering rushes)、“缟衣茹蘼”(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madder-[dyed coiffure])等。尤其像“茹蘼”，虽然是指红色佩巾，但译者只译了“茹蘼”，而将其隐含意义置于括号之中，表明译者英译时既参考了注释，又准确慎重。同时，理雅各对杂沓诗节重复式诗行的特征也予以一定的考虑。

英汉两种语言都必须以流畅性为标准。但原本语言因时代的变化而嬗变，原本在写作时是流畅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当时为读者所熟悉的一些概念、术语和词语，甚至包括一些句法现象，对后世读者来说，已经陌生了，语言的流畅度逐渐降低，由此注释和翻译对典籍的传承来说就变得必要。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文化的差异，原本语言的流畅性和译释语言的流畅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后一种语言的流畅性要低于前一种。但是，译者是以追求译释语言的流畅性为己任的，当然流畅度的高低取决于译者的观点和水平。《出其东门》原文为杂沓

式的两节,四字句式,六个诗句,每句押韵。其中“(思)存”与“(思)且”;“乐”与“娱”义同,只是出于杂沓诗节诗律的需要而出现的变化。英译时出于译释流畅性的需要,可以作适量的调整,而不损伤原意。理雅各的英译本在忠实于原文本的基础上,语句也很流畅,但是,他对原文短小精悍的四字句式以及每行押韵的诗律没有考虑,因此流畅性仍显不足。追求包括诗律在内的译释语言流畅度的中国译者许渊冲将此诗译为: 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 Like clouds fair maidens date. / Though they are fair as cloud, / My love's not in the crowd. / Dressed in light green and white, / Alone she's my delight. // Outside the outer gate / Like blooms fair maidens date. / Though like blooms they are fair, / The one I love's not there. / Dressed in scarlet and white, / Alone she gives me delight. 这个英译本的流畅度确实很高,可以说达到了许先生自己所主张的“三美”的要求。许先生的英译本明确体现了他的简洁流畅的韵体翻译语言风格。但是,许先生在追求流畅性的同时,对原文本学术性的追求显得不足。像“缟衣綦巾”、“缟衣茹蘼”,只英译了颜色,而对衣饰(衣、巾)本身区别的处理就显得模糊了;“如荼”简化处理为 like blooms,“荼”的概念意义以及白色的特征意义都被模糊了。虽然许译也加了一条注释来说明这篇诗的总体意义(A man praised his lover in white, contrasted with beautiful maidens dating 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of the capital of Zheng),但是译文本还是过于简化,像 fair 一词在上下诗节中均被使用,而对原文本注释中的“众多”和“清白可爱”的阐释未予关注。由此可知,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考虑,译文本的语言难以达到原文本那样的流畅度。

典籍英译研究在译学中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译学要处理像科学与艺术、忠实与通顺、音译与意译、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等等矛盾,而典籍英译还要处理学术性与流畅性这对特殊的矛盾。

在典籍英译中,学术性与流畅性是一对特殊的矛盾。这一特殊矛盾与译学中忠实(信)和通顺(达)的一般矛盾有一定的区别。第一,典籍的思想价值大大高于一般作品或著作,这些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典籍的注释和研究之中,典籍原文本经得起历代学者的阐释。我们将这些阐发典籍思想内容的注释和研究称为学术性。典籍英译的目的就是要传承和弘扬其思想价值,因此,对典籍英译学术性的追求与翻译一般作品时对忠实性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前者比后者要求更高。第二,典籍原文本语言是经典作家最高写作水平表达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其

总体特征是微言大义。由于长期的影响,其写作样式和文体风格为读者所熟知,其流畅性有着广泛的读者认知基础。这一前提条件给译者在英译中追求译本中训释性语言的流畅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译者需要在译入语及其文化中深入挖掘与原文本语言文化相似的表达方式,同时,对不相似之处可能采用音译或译文本注释的方式直接引入新的表达方式。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语言的流畅性缺乏读者的广泛认知基础,原文微言大义的文体风格是难以保存在译文本之中的。译文语言的流畅性需要在译文语篇中重建。对于诗歌语言而言,在尽量表达学术性的同时,为了保留一定的诗律特征,完全依赖译文本本身达到流畅性恐怕不可能,因此采用一定的注释来帮助是必要的。学术性与流畅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典籍思想价值的学术性要靠译文语言表达的流畅性来实现;另一方面,流畅性也是建立在学术性基础上的,削弱学术性的流畅性应该不算是典籍英译。

一个理想的典籍英译的译者应该是将这一对矛盾处理得十分恰当的译者。在《出其东门》的英译中,对这对矛盾处理得较好的是韦利。韦译是: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 Are girls many as the clouds; / But though they are many as clouds / There is none on whom my heart dwells. / 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① / Alone could cure my woe. // Beyond the Gate Tower / Are girls lovely as rush-wool; / But though they are lovely as rush-wool / There is none with whom my heart bides. / White jacket and madder skirt / Alone could bring me joy. (Note: ① Denoting a humble lover.) 韦译在充分吸收原文注释(如“如云,众多也”处理为 many as clouds;“缟衣綦巾,女服之贫陋者”,通过增加注释处理为 Denoting a humble lover;“荼,茅华,轻白可爱者也”表达为 lovely as rush-wool)的同时,在译文语言表达中尽量靠近原文本(如“缟衣綦巾”处理为 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译者除了增加注释来处理学术性与流畅性的矛盾以外,实际上还使用了转喻的认知手段,即用服饰代替人;另外,像“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这样的句法结构处理为 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 Are girls many as the clouds,除了增加了 many 以外,几乎与原文本句式一样,而译文语言也很地道流畅),这就显示了译者高超的处理翻译处理能力。可以说,韦利出色地处理了诗歌典籍英译中学术性与流畅性这对特殊矛盾。应该说,作为一位汉学家和译者,韦利对《诗经》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吸收了《诗经》研究中大量的注释和历代诗经学者的思想,通过重建译文语篇和增加注释等方法,除了没有押韵这样的微

瑕以外,已经将《诗经》英译推向了一个高峰。后世的译者应该在他的英译基础上继续努力。根据陆锡兴(2001:249)对《诗经》异文的研究,《毛诗》的“有女如云(雲)”在《诗经鲁诗》中是“有女如芸”,这与下文中的“有女如荼”构成了对照,“芸”比“雲”更贴近原意,因为这反映了中国古代“香草美人”的传统,同时,“芸”与“茶”从芳香到轻白,在诗意上更好地表达了两个杂沓诗节的语意关系,而“雲”(众多)反而显得不甚贴切。由此,根据陆先生的研究,我们在韦利以及其他译者的基础上,将《出其东门》重译为: 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 Are girls sweet as rue's trait; / Though they're sweet as rue's trait / To none my heart'd relate. / The robe bleach'd and scarf grayed^① / Makes me a happy mate. // Outside the front Gate Tower / Are girls white as rush-flower; / Though they're white as rush-flower / On my heart they've no power. / The robe bleach'd 'n' madder co'our^② / Brings me a happy hour.^③ (Notes: ① The original line means “[The one who wears] white robe and gray scarf”, denoting a simple dress. ② The original line means “[The one who wears] white robe and madder [coloured scarf], denoting a simple appearance”. ③ The original line means “[her] I would be happy with”.)

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的成就,不仅因为是他最早英译《诗经》,更重要的是,透过他忠实的带注释的英译本,广大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接触、了解和掌握《诗经》的学术性或思想价值。《诗经》作为诗歌典籍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其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承载的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肯定的时候,也有否定的时候。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发现,儒家思想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有值得中国和世界引以为豪的普世价值。否定了这一点,就等于削弱了典籍英译的意义,模糊了典籍英译的目的。但是,任何好东西,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包装,让她在诗歌美学的关照下,有个美丽的外表,这样才能引起读者(尤其是入门的读者)的关注。通过韦利的英译,我们知道,坚持学术性,又注重流畅性,让两者走向辩证统一,让这对矛盾走向和谐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像韦利这样的译者。在当今形势下,我们需要中国译者具有或超过韦利那样的水平。

以上我们提到典籍翻译是典籍注释的延伸,译者是注释者的延伸,由此,我们还可以推知,译者也是学者的延伸。纵观历代《诗经》注释和翻译,每个时代的

学者和译者都因时代的需要而侧重和挖掘了《诗经》的不同方面。这种侧重和挖掘便是他们的主体性。同时,学者与译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母语与外语的语言差异和词语与语篇的文本层次差异上。这两点差异引起了诗歌文本的语言嬗变。

在历代学者的注释和研究中,在不放弃“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的基础上,汉代《诗经》注重的是经学价值,宋代《诗经》注重的是理学价值,清代《诗经》注重的是朴学价值,而现代《诗经》则注重其民俗学价值,因此他们的注释各有侧重。译者也是这样。不同时代或时期的译者也侧重了《诗经》的不同价值。理雅各侧重了《诗经》的经学价值,韦利、杨宪益夫妇、许渊冲、汪榕培等侧重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但他们的价值设计却有着各自的不同。韦利虽然主张《诗经》的文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但是他对《诗经》研究十分深入,英译时十分注重其学术性,因此他的价值设计既有文学性,又有经学性。在文本重建中,他通过增加注释等手段又做到了译本语言的流畅性。上文对韦译进行了一些评论,这里我们以杨宪益夫妇的译例来说明。杨宪益夫妇《出其东门》的译文是: Outside the eastern city gate, / Girls look like colorful clouds. / Though they are lovely as clouds, / Yet none is the one who dwells in my heart. / Only she of the white dress and greenish scarf / Would I be eager to meet. // Outside the outer city gate, / Girls look like reed catkins. / Though they are pretty as reed catkins, / Yet none is the one who remains in my heart. / Only she of the white dress and scarlet kerchief / Would I be overjoyed to see. 杨译在价值设计中明显强调了文学性,因此增加了文学性的表达,如以 colorful, lovely, dwells in my heart, eager to meet, pretty, overjoyed to see 等词语来描写云的色彩和情感、爱情的特征和见面的心情。增加这些词语充分显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重建文本时的价值设计。可以说,译者通过文本重建来实现他对原文本思想价值的一种训释主张,这种训释主张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是文学主张,20多年后汪榕培的重建文本则显示了更强的文学性: Off the East Gate is a crowd / Of fair maids like a colored cloud. / A colored cloud as they now are, / They have not moved me so far. / In a scarf of green and plainly dressed, / This very maid has me impressed. // A crowd is outside those gate towers; / Among them maidens are like flowers. / A flowery cloud as now they are, / They have not touched me so far. / In a scarf of red and plainly dressed, / This very maid has me impressed. 汪先生在英译中实践着他的“传神达意”主

张。首先,他主张以诗译诗,创立了新格律派。虽然他的格律还不甚严格,但通过跨行(如上节首二句)、意译(如上、下两节次二句以及末二句)、增词(如 fair, colored, now, this very maid)、变换(如上、下两节的首二句)、上下联通(如 a flowery cloud)等手段的创造性使用,重建了更为流畅的文本,达到了“传神”的效果,体现了汪先生强调文学性的价值设计。通过以上两个译本的比较可知,不同的价值设计必然产生不同的重建文本。

对《诗经》这样的诗歌典籍,在今后的英译中,出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回归儒家的思想价值,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让《诗经》的思想发挥更好的普世价值,为此而重建相应的文本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围绕着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是学术性与流畅性辩证统一中的文本嬗变这一总体思路,我们在本书中从“总论”、“语体论”、“借鉴论”、“特征论”和“译本论”等五个方面对诗歌典籍英译进行了分别的论述。这些论述对诗歌典籍英译问题作了一定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是散论性的,但我们希望对典籍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杨成虎

2012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总 论

- 典籍英译研究的另一种思考 2
诗歌翻译与诗歌典籍翻译 13

语 体 论

- 诗歌典籍的韵译与散译 23
诗歌典籍英译的译语问题 32
诗歌语篇的语言特征及翻译问题 41

借 鉴 论

-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诗歌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50
《大正藏》所载《法句经序》异文本校点与疏释 62
典籍英译“传神达意”理论概念体系的阐释 81
雷克思罗斯“融创于译”的诗歌翻译思想 89

特 征 论

- 诗歌典籍英译的译者问题 98
诗歌典籍英译的版本问题 108
诗歌典籍英译的考证问题 114